

个人与文化:高校社会职能的两个出发点

——兼与徐辉同志商榷

邓耀彩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是教育理论中不可穷尽的研究领域,曾倾力关注这一问题的甚至有像杜威这样伟大的教育家。他们的结论虽然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但也远不是终结的。在迅速变化发展的社会中,教育与社会的边界及教育对社会的适应方式,都在不断地变化,从而为教育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高等学校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其社会职能则表征两者间相对直接的一种关系。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可以理解为高校向社会的输出方式,是高校连接社会的重要通道。随着高等教育对社会贡献的不断增加,高等学校社会职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有关的争议也日渐多见,各种观点纷至沓来。在这种情况下,分析高校社会职能的理论框架的构建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即以此为目的。

一、高校社会职能的分析框架

对高校社会职能的认识应是一种理论,至少是一种概括。任何理论归根到底都来源于实践,但如果考虑到理论之间的次生与关联,则次生理论也可由基本理论演绎形成。具体地讲,高校社会职能固然可由高校的现实活动概括而成(这是必不可少的),但要真正具有理论的形态,则必须结合基本理论的演绎或借助关联理论作为分析的工具。

1. 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实状态,是分析高校社会职能的基础

为我国高教界普遍接受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高校“三职能说”,即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或称之为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直接为社会服务,它的形成就是以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为依据的。中世纪大学以培养人才为其主要职能;洪堡从培养人的个性出发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事实上使大学起到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在19世纪后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成立大学拓展部,稍后的赠地学院继承这一做法,开创了高等学校直接介入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是为高校第三职能的起始。80年代初期,在概括高等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高校“三职能说”,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2. 教育价值观与高等教育价值观,是分析高校社会职能的基础理论

这样说,首先是指,在概括高等教育的实践活动,为构建高校社会职能的理论作准备时,人们会受到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的制约。例如,赫尔巴特在学校教育中看到是课堂与知识,而杜

威则看到的是儿童,这里面就有价值观的因素在起作用。价值观作为一种主观的偏好,它可以显性或潜在的形态表现出来。克普克洪将文化分成显型文化与隐型文化,并认为“隐型文化所构成的文化主题,在根本上不为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所系统而切实地认识”^①。由于在事实概括阶段,理论的分析未完全展开,故潜在的、隐型文化观念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其次,高等教育价值观是演绎高校社会职能的逻辑起点。高校社会职能指高校向社会的输出,对事实的概括指明了高校现实的输出“是什么”,而理论体系构建的结果则应指明“应该是什么”。很明显,“应该是什么”这一理论体系的演绎,必须以高等教育价值观为起点。

3. 个性发展理论、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是分析高校社会职能的关联理论

我们在后面将会论证,个人与文化是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基本元素。因此,有关这两个基元的理论,包括个性、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必定是分析高校社会职能的关联理论。

二、对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看法

我们通常是在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与统一中考察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并根据主体对个人与社会选择的偏向程度,将之区分为不同类型的。但有论者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楔入了第三变量——知识。^②这说明,可能存在个人、知识、社会的三元价值选择模式。如果选用三元价值选择模式,则会由于缓冲变量的存在而使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变得缓和,从而在理论上突破了二元价值选择的平面模式,对实践也有更强的适应性。中世纪大学中的个性发展与社会主旋律处于全面对立与冲突状态,但由于中世纪大学以知识为中心价值取向,从而缓和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冲突,依然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进一步考察上述价值选择模式,我们会发现,以知识作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物,尚不够全面的地方。因为从哲学的高度而言,知识指人类的科学认识成果,即“真”,而且还包括“善”与“美”;对“真”、“善”、“美”的总括即指人类文化。因此,构成三元价值选择模式的基元应为个人、文化、社会。

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一种什么关系呢?在这里,个人指个性发展的要求,社会则包括社会结构及维持其稳定的各种条件,文化指的是人类精神成果的总括,在个人与社会间起着中介作用。对于文化的中介作用,前苏联的E·A·瓦维林和B·Л·弗法洛夫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他们认为,文化的外延涵盖了整个社会,弥漫于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因而具有普遍的中介作用。^③普列汉诺夫也从社会心理的角度阐述了文化的中介作用。在三者的关系中,还应注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总括,是一种凝固化了的静态结构,其本身并没有自动的性质,柏拉图式的理念运动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运动是不存在的;就社会结构而言,虽然任何一个社会都具有适于运动的特性,但只能停留在其自身的限度内;一定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都具有相对的惰性,二者之间也较易结成同盟。而个性发展则不同,虽然它必须受到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制约,但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个性发展的创造性,决不仅仅表现为对已有静态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维持,更表现为对它的突破。在皮亚杰的主体认识图式论中,主体的建构是双向的,一方面主体将早先的经验内化为认识图式,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以形成对客体的认识。这样,主体的形成既要适应客体,又要不断地突破客体,而这不断被突破的客体应指静态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由此,在三元价值选择模式中,对立的双方表现为以个人为一方,文化与社

会为另一方;而且文化以社会替代物的形式出现,尤其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人与文化之间的对立。本文即以个人与文化的对立为教育价值观的基本形式。

三、对徐辉同志观点的理解

徐辉同志的《试析现代高等学校的六大基本职能》一文(载《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4期,以下简称徐文),力求从理论的高度分析高校的社会职能。该文以知识为基点架构了一个较为严格的高校社会职能体系,认为高校的社会职能包括“保存知识,传授知识与培养人才,传播知识,增进知识,应用知识,社会批判与监督”六项;而且将高校培养人才的职能放在传授知识的范围内,可见知识在其社会职能体系中确实占有主要的地位。至于为什么,徐文却语焉不详,只是认为以高校的活动对象为起点可能更合适些。我理解,徐文中所指的高校活动对象意指高校活动的软性资料,应该包括知识和其它精神产品,即指的是文化,因此,知识起点应为文化起点;另外,高校活动的对象除文化外,还有人——学生。据此,高校社会职能应为双起点:个人与文化。

徐文的观点反映了一种知识中心价值观,而这又受大学的传统、我国高校活动的现实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试析如下:

第一,文化功能是高校的古老传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大学,虽然高等教育的形态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其文化功能却历历史风雨而被坚持下来,并形成了深厚的传统。

第二,在现代社会中,实用知识的地位日益提高,高校传播知识的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迈进,短期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开放大学等非正规高等教育形式不断涌现,高等教育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日益密切,甚至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大众传媒。这一方面反映了高校与社会联系的加强,体现了高等教育走出象牙之塔的某种必然性;但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猛增,也使人们沉浸在被波普称为“世界3”的知识王国中不能自拔,人被知识控制了,事物走向了反面。无怪乎有人感叹,在目前人能赋予机器以智能的时代,人却变成了知识的机器。当前如潮般涌来的市场经济,更强化了高校传播知识的职能。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的特征是放任经济的自组织生长,实用知识由于与经济的关系比较密切而日益受到重视,高等教育传播知识的功能也就更加重要了。

第三,在我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追赶发达国家的急切心理,因此,我们在向西方学习时着眼于操作层面。首先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人不过是船坚炮利,我们拿来操作便行;尔后是明白自己的制度不如人,又想拿别人的制度来操作;最后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的论争,讨论的仍是精神层面的操作。这种操作心理在当代依然根深蒂固。如果从操作的层面看,确实,静态的知识与文化较易操作,而个性的操作则较难。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操作意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表现,即知识中心价值观一直处于强势地位。

第四,从哲学的高度看,知识中心价值观反映了我国忽视个性发展的教育传统。我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观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主客不分,物我两忘的境界。正是这种主客不分,导致我们忽视主体性原则,缺乏认识客体、征服自然的进取精神,人格价值只有在分享天道价值权威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样,主客体走向了其反面,天(自然)变成了主体,人变成了客体。人不求弘扬自我的价值本体,不积极地以主体为价值尺度去能动地改变现实,自然也就无

法培养出弘扬个性的教育传统。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走向了科学一元论。这种科学一元论与忽视个性的传统相结合的结果是形成了知识中心价值观。这样,我们从西方学到的只是现代的静态知识,而弘扬主体性原则、弘扬个性的文化之根基依然留在西方,我们只是从人家的树上攀枝折叶罢了。因此,重视个性,改造我们的文化,乃我们现代化之根基所在。而这,必须自教育始,自高等教育始。

由此观之,徐文所构建的高校社会职能体系,虽然力图突破经验的局限,给以系统的理论,但其赖以基元的知识中心价值观只是现实地反映着高校社会职能的某些偏向,其构建的理论也自然只能指向“是什么”,而不能指向“应该是什么”。

四、以个人与文化为双起点分析高校社会职能

从教育价值观的角度来说,在个人与文化的冲突中作目光短浅的取舍是不适宜的。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文化积累的结果反过来又会对人的活动产生强有力的制约作用。这使得许多教育家为高校成为“知识工厂”后,精英文化的堕落而倍感忧虑。在这种文化发展的二律背反中,如果不重视个性的培养,人类的发展与人类文化的积累都将裹足不前。因而个性发展与文化积累都是高校应承担的社会职责,个人与文化应该成为高校社会职能的双起点。从此出发,高校的社会职能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培养人才,发展个性

无论是中世纪的高等教育还是其它任何时期的高等教育,只要是高等学校,就必须把培养人才摆在首要的位置上。但是,并不是所有时期的高等教育都是把个性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上的。个性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在西方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需要大批务实肯干、具有强烈进取心的人才,它反映在教育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上就是个性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至成为西方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传统。

高等学校要重视个性的发展,反映了高等学校区别于一般大众文化的特殊文化性质。高校固然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高校亚文化与大众文化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但它作为一种文化范型,与大众文化相比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作为文化承载者的个体那里则源于个性的自由与充分发展,使其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与自我扩张意识、敏锐而广泛的求异思维以及深刻的批判精神,为社会带来气息清新的思想观点。高等学校的这一特殊文化性质,在现代社会里变得越来越重要,并经常地成为社会创造力的源泉。

我国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缺乏个性发展的自由土壤;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指导下,高等学校在培养人才、发展个性方面作了不少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成就显著,但目前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甚至相当严峻。追求安逸,缺乏进取心的颓废倾向有不断扩张与渗透之势,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我们努力实现现代化,走向新的文化阶段的重要时刻,充分发展人的个性是高等学校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2. 文化创新与文化涵化

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既包括对文化的选择重组,也包括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传承;同时,由于这些活动立足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沿,立足于人类文化的生长点,因此必然会延伸到文化创新。在这些文化活动中,有的属于高校内部的文化整合,有的属于高校对外部的文化输出,只有

后者才属于高校的社会职能。就高校对社会的外部文化输出而言,它又可以分为文化创新与文化涵化两种方式。前者是高校的部分文化输出,后者则是指高校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文化创新指高校要不断地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在基础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发挥持续的推动作用。它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世纪中,高校将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和中心。这是研究型大学文化输出的主要方式。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是指两种层次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进行双向交流的渐进过程及其相互融合的自然结果。很明显,高等学校的文化涵化作用是与社会大众文化的整体相互作用,各种诸如开放大学之类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向社会的文化传播与社会以及社区发生相互作用,有的甚至成为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它是大众型高等教育文化的主要社会输出方式。

3. 社会批判

社会批判要求批判者能站在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峰巅,借助于深刻的理性、广泛而敏锐的求异思维所形成的批判精神,俯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洞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误区。深刻、有见地的社会批判,源于批判者个人的素质,批判精神赖以存在的文化氛围以及超出于社会局限的条件。而所有这些都是高等学校所具备的。高等学校亚文化与社会大众文化之间保持的适当距离,使人能够免除“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个性的充分发展,为良好个人素质的培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深厚的学术传统,则是怀疑精神滋长的适宜土壤。因此,高等学校是最有资格进行社会批判的。以前我们对高等学校的独立性,其社会批判能力重视不够,以单纯的工具视之,因而不能充分发挥高校社会批判的职能,这些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不言而喻,社会批判的职能主要是由研究型大学担当。

注 释:

- ① 克莱德·克鲁克洪(clud kluckhohn):《文化的研究》,见《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 ② 王伟廉:《高校专业与课程建构的基础理论》,见王伟廉等著《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理论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146页。
- ③ E·A瓦维森、B·J弗洛洛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多处证述了文化的中介作用,虽然其文化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但并不影响其结论的适应性。

(上接第21页) 本身必须是精英。首先,校长应该是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品德高尚,远见卓识,以造就一代新人,开拓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能够在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的冲击下,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保持校园的纯净与高洁。其次,教师队伍自身应具备攀登科技高峰的动力品格,从事大科学、大教育、大生产的思想观念和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能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在激励学生大志,转变学生观念,增长学生才干上发挥领路人的作用。再则是广大员工,也应品德高尚,勤劳敬业,甘为教学服务,能以自己的奉献精神感召学生群体。

然而,对照上述要求,看看校园内人员素质低下、市民文化泛滥的现状,实际上不少大学,包括理工大学存在“重建摇篮”的问题。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但只要办学胸怀“理工大学的理想”,并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